

## 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 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現代意義

王晴佳\*

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代表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重大轉折，其主要特徵是，五四時代的學者在接受西方科學文明的基礎上，試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提出一個新的解釋，以改造文化、革新傳統為手段，追求中華民族國家的富強。在中外文明的交流史上，這一個新文化運動顯示了中國人在吸收、消化外來文化方面的高度熱忱，是晚清以來所未曾見。當時這個熱忱的對象，基本上完全投注於西方文化。甲午戰後中國青年對日本迅速崛起所激起。五四運動的當天，學生們高喊「還我青島」、「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焚燒了親日派曹汝霖的房子，就是一個例證。有趣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在凡爾塞會議上對中國提出接收德國在山東權益的要求，無疑是得到西方強權首肯的結果，而日本的帝國主義作法，也顯然是效法的西方強國。但是，這些似乎都沒有影響當時中國年青人對西方文化、科學的熱情嚮往。

五四青年對西方文化的憧憬，可以說是兼容並蓄，從古典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顯示很大的興趣。於是，五四運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開端，在中國大陸得到推崇。而 1949 年後退居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則對如何紀念五四運動，常常顯得舉棋不定、欲言又止。不僅在臺灣，那時離開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中間，對五四運動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的人，還不在少數，例如「新儒家」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 1958 年在香港發表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就代表了這一種立場。他們基於復興中國儒家文化的立場，呼籲對五四以來中外文化、特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進行深刻反省，這種反省，自然也包括對五四時期熱心「西化」的批評。大陸開放以來，學界逐漸對「新儒」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對他們所持的復興中國文化的立場，也開始表現出同情的立場。大陸學界、出版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者吳宓及其學衡派所表示的興趣，就是一例。這些變化，對我們重新考慮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及其影響，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角度。

本文寫作的目的在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外文化之間的交流及其內涵。我並無意否認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提倡中國文化對外開放方面的貢獻和影響，相反地，本文試圖在肯定這一前提底下，對五四時期中外、中西文化交融的狀況，從史學革新的角度，做一個比較細緻的觀察，以求獲得一些新的認識，從而對中華文明如何在新的世紀與世界其它文明進行交流和融和，提出一些啟發性的建議。

---

\* 美國 Rowan 大學歷史系教授。

# 一、五四史學革新的背景

中國文明不但以歷史悠久聞名於世，中國史學傳統的悠久與豐富也舉世聞名。中國人對自身文明的自豪感，來自於這種深源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的形成，與中國的史學傳統大有關係。從其起源來看，中國史學傳統的建立，與中國人的宇宙觀、世界觀不無聯繫。從歷史感的誕生來看，結繩記事是一種近乎自然的心理發展。但古代中國人的記事，包括了人類與自然界的重大事件，與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有關。雖然現存的《春秋》只有一部，而且還殘缺不全，但從中我們也可看出《春秋》的思維方式對歷史著述的影響。在《春秋》中，自然界的變化是人類歷史變化發展的框架，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代表了基本的時間觀念，為歷史記載提供了方便。

這種時間觀念以其循環往復為特徵，因此也影響了古代中國人的歷史觀。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就是循環史觀的一個例證。如果說《春秋》中確實隱含有孔子的「三世說」—據亂、昇平與太平—那麼這種「三世說」也同樣以循環史觀為基礎。孔子的「信而好古」自然反映了他對古代的嚮往，但這種嚮往還是有一種循環論的前提，就是希望美好理想的過去會在將來重新回來。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循環論的歷史觀念，不但促使古代中國人不斷依照時間的順序往返記載歷史，而且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全面的、長久的歷史認識。這種認識同時包含了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三個方面。如果以《春秋》為代表的編年體史書，是「結繩記事」的一種文字形式，那麼這種「結繩記事」，遠遠不是僅僅出於一種對於現實與現世的關心而已，而是體現了一種對整個人類歷史的思維勾畫。

有了對《春秋》等史書這樣一種歷史哲學的認識，我們就不難理解司馬遷所揭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理想的由來。司馬遷本人有其高遠的理想，但他之「究天人之際」，還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的。他本人對孔子的推崇，就是一個例。即使如此，司馬遷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明確表明他的理想追求，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司馬遷《史記》中的「史」，用現代的語言來說，不僅可以被認做是複數的，也可以是一以貫之的單數，取決於我們把《史記》放在什麼樣的尺度來評價。但無論怎麼看待，《史記》所體現的是古代中國的一種複雜的歷史思維，既有時間的深度，又有空間的跨度。

自從司馬遷以來，中國史學不但改變了記述的形式，從編年改到紀傳，而且也變得愈來愈政治化，因此史學的範圍逐步狹窄，以朝代的興亡為主題。但是，從史學觀念來看，仍然保持著廣闊的幅度與長遠的眼光。中國史家記述朝代的興亡，已經自然有過去與現在的兩個方面：他們所記錄的是前代的、過去的歷史，但歷史記載則有現在的因素，因為是現在的人在進行這一記載的活動。更重要的是，史家記載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將來，即為了維持和長當朝政權的統治。於是，一部朝代史，在時間上包含了過去、現在與將來，儘管它記載的只是一個朝代的歷史。

這種以過去為資鑒，也就是「以古鑑今」的歷史觀念，在東漢以後的年代裡，也表

現在有關所謂「正統論」的討論中。「正統論」討論的中心，是如何確定王朝更替的正統性。這個問題在東漢滅亡以後，顯得十分尖銳。但史家之所以對這個問題如此關心，還是出於一種對將來的思考，即如何在中國的歷史中，找到一個一以貫之的沿革傳統。這種重塑傳統並追求正統的作法，到了唐朝的韓愈，則被用來總結儒學，即所謂「道統」的沿革變化，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但這種重塑傳統的需求，正是因為歷史的斷裂所產生的。從東漢到隋唐、從隋唐到北宋以及南宋，都有長短不同的分裂時期。這種分離時期的存在，使得史家更為注意「正統」，強調過去與將來之間的聯繫。為了建立這種聯繫，史家就必須根據需要重寫歷史，以便正確地表述歷史的演變。宋代歐陽修的「新」史，就是一個很重要和明顯的例子。歐陽修新修的歷史，不但是在重塑過去，而且是在構造現在和將來。在唐宋以來，由於文化傳統的劇烈變動，這種對歷史加以重新整理，提出新解的舉動，並不少見。《三通》的寫作，乃至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表現了這樣的企圖。這種對通史的熱心，雖然上承司馬遷，但也與中國的歷史思維傳統十分契合，因此這些史學著作的出現，大致上都得到不少好評。

到了明清兩代，文網日密，史家著史，往往招致殺生之禍，因此到了清代，便盛行考史、評史，在考評中抒發己見，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雖然清代的考據家以考證為業，但其實他們仍然具有「通史」的眼光，如清代三位歷史大考據家王鳴盛、錢大昕和趙翼的作品，都沒有侷限在一兩部朝代史，而是企圖評論許多部「正史」，以求對以往的歷史，獲得一種通盤的瞭解。他們的評注，也往往摻雜了對歷史變動所做的解釋，不僅是一種文字上的訂正而已。

既然中國的史學傳統中有如此悠久的思維傳統，因此到了十九世紀，當中國面臨危機的時候，史家自然又承擔起重修歷史與重塑傳統的任務。在起初，魏源、徐繼畲、梁廷枏等人的著作，只是想「開眼看世界」，將在明代中期中國閉關以來所產生的劇烈變化，告知國人。他們的著作，為重修歷史建立了必要性，也為政治上的變法，提供了理論論證。甲午戰敗的慘痛，使得人們更加認識到變化的必要和必然，因此許多青年人前往日本，他們想尋找的不但是西方成功的秘密，而且是「西化」成功的秘密。他們的日本之行，為中國史學的革新，提供了便利的樣板。日本史家不僅用「新式」手段寫作歷史，而且寫了「新式」的中國歷史，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流行，就是一例。梁啟超的《新史學》，也直接受到了浮田和民的啟發，而「國粹學派」的「國粹」兩字，則是日語的直接借用。既有重修歷史的悠久傳統，又有東洋近鄰提供便利的樣板，加上那時的人視「西化」為富強之道的認識，中國史學在二十世紀初年的大幅革新，因此就變得順理成章。

## 二、傳統與新潮的交融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這一波史學的革新，雖然有現實的考慮與外界的影響，但還是

得益於中國的文化傳統。我們在前節不厭其煩地將中國以往的史學傳統加以分析，正是爲了讓讀者更爲清晰地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舊兩重性。既然我們已經在上面對傳統做了比較詳盡的描述，我們現在就來著重看一下「新」的方面。

二十世紀初年史學革新的首要特徵，是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梁啓超在 1902 年寫作《新史學》，在起首便強調史學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密切聯繫。他說：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爲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sup>1</sup>

梁啓超不僅指出史學研究能增強愛國心，強化民族主義，而且以歐洲爲例，認爲民族主義能幫助文明的進化。有意思的是，他還認爲中國的舊學問中，史學有革新的可能。

幾乎同時，同樣有日本經驗的《國粹學報》諸學人，也認爲民族主義是史學革新的主要動力。如黃節就在〈黃史·總敘〉中說道：「西方哲儒論史學之關係，有國家與人種兩端。柏林史學大會宣言曰：提倡民族帝國主義，造新國民，爲歷史家第一要義，否則外族入霸、國恒亡」。<sup>2</sup>他所寫作的〈黃史〉，以中國人種的演變爲主要線索，敘述社會總體的變化演進，因此書的起始便列「種族書」，其中討論「種源」、「種別」、「立國」、「種名國名」等諸節，顯然把民族主義史學視爲新時代史學著述的主要模式。<sup>3</sup>

這種民族主義史學，如梁啓超和黃節等人所言，主要是起源自西方，雖然他們也參考了日本的模式。民族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就是國家的強盛與民族的進化，因此與十九世紀後半期流行西方的進化論思想，有深刻的聯繫。用進化論觀點看待人類歷史的變化，有兩個基本特徵。首先是把人類的歷史視爲單一而直線的演化過程，由低到高，不斷進步。其次，進化論史觀雖然重視人類歷史的一體性，但在具體論述時，則以民族國家爲基本單位，衡量國家之間的先進或落後，提倡相互競爭與適者生存。黃節在前面所言，非常明確地表述了西方民族主義史學的這些特徵。

在梁啓超、黃節等人倡導民族主義史學的時候，中國人對進化論思想，已經不再陌生。留學英國的嚴復，已經把《天演論》等西方進化論的論著，譯成了中文，在思想界引起激烈反響。事實上，在嚴復譯這些西方著作以前，中國人已經接觸了用進化論觀點寫作的歷史著作，如在 1894 和 1895 年，傳教士李提摩太就將 Robert Mackenzie 的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十九世紀史），通過助手而譯成了中文，題爲《泰西新史攬要》，先在《萬國公報》上連載，以後又出單行本。出版之後，適逢百日維新，因此非常暢銷，銷售達一百萬冊以上。<sup>4</sup>這些譯作，爲推廣進化論的歷史思想，發揮很大的作用。因此，梁啓超在《新史學》中界定史學的定義時，一連在三處用了「進化」，

<sup>1</sup> 梁啓超：《梁啓超史學論著三種》（香港：三聯書店，1980年），頁3。

<sup>2</sup> 《國粹學報》第1期（1905）（臺北：文海出版社重印），頁43。

<sup>3</sup> 同上書，頁47-60。

<sup>4</sup> 見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頁10-15。

認為新史學的基本宗旨，就在於把進化的道理，通過歷史的敘述，表述出來。<sup>5</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股追求進化論史學的潮流，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獲得了新的涵義。它不僅是解釋歷史的手段，也是研究歷史的方法。這一新的含義的發現，歸功於胡適，胡適在介紹其老師杜威的實用主義科學觀時，將進化論的思想放在方法論上做了分析。他說：

這種進化的觀念，自從達爾文以來，各種學問都受了他的影響。但是哲學是最守舊的東西，這六十年來，哲學家所用的「進化」觀念仍舊是海智爾（Hegel，通譯黑格爾）的進化觀念，不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的進化觀念。到了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家，方才把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拿到哲學上來應用；拿來批評哲學上的問題，拿來討論真理，拿來研究道德。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怎麼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sup>6</sup>

這種方法論的轉變，在那個時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一旦進化論的思想成了一種研究學問的方法，那麼它就不再是西方所專有的了，而是可以讓其它地區的人也拿來運用。這樣一來，人們對進化論的思想，也有了一種新的認識。它不再僅僅是爲了突出西方文明在現代社會的優越和超前，而是可以研究文明先進與落後的原因與過程，其應用面大爲擴大。胡適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就想通過這一「進化的方法」，尋找中西文化的共同點，即「用現代哲學去重新解釋中國古代哲學，又用中國固有的哲學去解釋現代哲學」。<sup>7</sup>這種從方法論的層面溝通中西文化的作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特色。

因此，五四時期雖然一心追求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但至少在學術思想和方法上，仍然體現出一種新舊融和的特徵。換言之，如果說梁啟超等人在二十世紀初年提倡「新史學」，希望用進化論的觀點重新寫作歷史，已經上承中國古代重修歷史的傳統，那麼胡適等五四學者的作法，則更爲清楚地顯示，這一「新史學」的事業，必須建立在對舊有的傳統的新的解釋之上。於是，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由此出發來建立中國的現代學術。<sup>8</sup>

五四學者的具體作法是，一方面用西方輸入的科學方法，對傳統文化提出激烈的批評，其態度遠甚於晚清那些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學者。但在另一方面，五四的新派學者又追求中華民族的重振，因此並無意將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他們的目的是，

<sup>5</sup> 《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頁 10-15。

<sup>6</sup> 胡適：〈問題與主義〉收入：氏著：《胡適文存》，第 1 集，第 2 卷，頁 66-67。有關這一方法論對當時史學的影響，另詳：王晴佳：〈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中華文史論叢》，62 期，頁 1-84，特別是頁 22-26。

<sup>7</sup> 胡適：《先秦名學史》，見：《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姜義華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下卷，頁 776。

<sup>8</sup> 有關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陳平原所撰：《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爲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一書有比較詳盡的討論。

首先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然後在一個新的、科學的基礎上「再造文明」，也即重寫中華民族的歷史，於是，史學革新就成了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組成部分。從「新史學」的先驅梁啟超，到五四時期的代表人物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他們都從史學方法論的革新入手，重新審視中國的文化傳統，在科學方法的基礎上，以新的手段闡述過去與現在的聯繫。他們的成就，代表了中國史學的一個新的階段。

由此看來，五四時期的史學革新，同時包含了「破」和「立」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的工作，都採用了同樣的方法，就是對史料的考證、史書的鑒別，以求對過去獲得一種精確而可靠的認識。對這種研究方法的認同，主要還是通過胡適的論證。胡適是杜威弟子、留美博士，他對現代科學方法的闡述自然有一種權威的影響。饒有趣味的是，胡適一方面推崇現代科學方法，延請杜威來華講學；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企圖在中國舊有的文化傳統裡面，發現現代科學方法的成分。胡適在 1921 年寫作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文章的起始，胡適便指出，以西方的經驗來看，科學方法包括演繹和歸納兩種，特別是兩者的結合。由此出發，他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從方法論的層面做了觀察。他的結論是：「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sup>9</sup>然後他便開始論證他的觀點，胡適以錢大昕等人的著作為例，從清代音韻學、訓詁學和校勘學等幾個方面，檢驗清代考據家運用演繹和歸納方法的作法，以證明他們研究方法的科學性。這一科學性，用胡適的話來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sup>10</sup>

眾所周知，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他治學的座右銘，也是他作為新派科學學者的標誌。有趣的地方是，他不僅對這種科學方法用中文做了簡煉的表述，而且宣稱這種方法乃是基於清代考據學家治學的經驗。於是，原來被認為是屬於現代西方的科學方法，一下變得親近起來，不再隔膜、陌生。正是通過這樣的「漢化」過程，現代科學方法在現代中國開始得到了普及。譬如，沒有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顧頡剛，在回顧他挑起「古史辨」的討論時，也認為胡適所表述的科學方法，對他啟發很大。<sup>11</sup>

的確，「古史辨」的討論，是這一種科學方法的首次使用，其效果主要體現在「破」的方面。在討論中，顧頡剛、錢玄同、胡適等人運用文獻考證的手段，鑒定古書的真偽，發現不少古人作偽的現象。於是，顧頡剛大膽斷言，先秦以前的中國古代史，毫不可信，所謂三皇五帝，只是後人杜撰、想像出來的。這一結論，引起不少人的反對，討論於是就變得十分激烈，在學術界造成了「疑古」和「信古」的兩派。<sup>12</sup>顧頡剛之「疑古」，自然受到了胡適所界定的科學方法的影響，但他在〈古史辨自序〉中，還提到了其他人，譬如章太炎、康有為，甚至更早的崔述、姚際恒等人。至於他所提出的所謂「層累地造

<sup>9</sup> 見葛懋春、李興芝編：《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上冊，頁191。

<sup>10</sup> 同上書，頁194-211。

<sup>11</sup>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收入：《古史辨》（香港：太平書局，1962年），第1冊，頁1-103，特別是頁59-60，77-80。

<sup>12</sup> 這項討論影響之深遠，可以從大陸學者李學勤最近提出的「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中，見其一斑。

成的古代史」的觀點，則與他喜歡中國戲曲有關。<sup>13</sup>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二冊自序中，則乾脆說，他的疑古是「今文古文討論百餘年後該作的工作。」<sup>14</sup>由此看來，雖然「古史辨」的討論是新文化運動中對傳統的一種激烈的批判，但其學術淵源，則大致上是承繼了清代學術的傳統，從方法到觀點都沒有太大例外。

如果說「古史辨」的討論反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傳統學術的深刻影響，那麼在這以後，這一情形就變得更為明顯。在胡適倡導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時候，起而響應的不僅是顧頡剛，還有何炳松、傅斯年，甚至還有比胡適年長一輩的梁啟超等人。「整理國故」，主要是從史學方法上入手，尋找中西文化之間共同點，比如，梁啟超和何炳松都寫了史學方法方面的論著，而傅斯年在留學歐洲的時候，也一心想找到西方科學的「真學問」，也即科學的方法。他在回國以後，在北大上的課，也是史學方法論，從方法論的角度，傅斯年對史學做了一個定義：

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圍，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sup>15</sup>

與胡適一樣，傅斯年認為達爾文進化論，可以是一種科學方法。但是，傅對科學方法的應用度的理解，則比胡適更為廣泛，在他看來，科學方法只有一種，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這就比胡適更為清楚地講明，科學方法完全適用於整理中國傳統的學問。傅斯年對科學方法所提出的這種實證主義解釋，有助於史學的進一步革新。我們將在下面再述。

何炳松與梁啟超在史學方法論方面的論著，只是當時眾多相似論著的兩種。但由於他們的學術背景和地位，因此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響力。何炳松是留美學人，回國以後又以翻譯西文歷史書著名，因此可說是一位十分「西化」的人物。何炳松的《歷史研究法》，顯示了他西方教育的背景，他在一開始便指出，現代的歷史研究方法，與中國古代的所謂「史法」（春秋筆法），有明顯的不同，也與傳統的「史評」、「史論」不一樣。他從現代史學的觀點出發，認為歷史研究的方法也即對人的歷史的研究，而不是對古代史著的評論。這裡何炳松引進了西方哲學傳統中的「主觀」與「客觀」的差別，指出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人類過去的活動，也即一種客觀存在的歷史。但是，他在下面又說道，雖然歷史研究的是過去，但由於這一過去是人的活動，因此又有主觀的因素。更有意思的是，他對這一主、客觀交融的解釋，則用了章學誠的論述：「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並且說這是「中外史學界中未曾有過的至理名言。就是現代西洋新史學家恐怕也不能說得這樣透辟精到」。<sup>16</sup>

何炳松不僅在界定史學與史學方法時力圖溝通中西學問，而且借用了不少傳統的治

<sup>13</sup> 《古史辨》，第1冊，頁1-103。

<sup>14</sup> 《古史辨》，第2冊，頁6。

<sup>15</sup>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收入：《傅孟真先生集》（臺北，1952年），第4，頁169-170。

<sup>16</sup> 何炳松：〈歷史研究法〉，收入：劉寅生等編：《何炳松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149-150。

學手段來論述歷史研究方法的步驟。他認為歷史研究需有以下的幾個步驟：搜集史料、辯明真偽、知人論世、闡明史料、斷定史實、比次史實和勒成著作。這些步驟，顯然受到了章學誠著作的影響。而他在闡述各個步驟時，還不時稱贊司馬光的《考異》，認為是中國史學史上有關史學方法的一個典範。<sup>17</sup>

如果有西洋留學背景的何炳松，都對中國的史學傳統充滿興趣，那麼在這方面有更深素養的梁啟超，表現當然就更為明顯了。梁在 1902 年提倡「新史學」時，曾對中國的「正史」傳統作了嚴厲的批判，認為只是一朝一姓的歷史，不是中華民族的歷史。但是，在他在二十年代初重新回過頭來檢視中國傳統史學時，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這一改變，與他在一次大戰以後遊歷歐洲，目睹西方文明戰後的悲慘有關，使他認識到西方強盛的背後，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同時，梁啟超也顯然受到胡適「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運動的鼓舞。因此，他受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書的時候，就開始從史學方法的角度，來比較中西學問在這一方面的相似之處。梁啟超在那個時期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體現了他的努力，其影響十分深遠。

與何炳松一樣，梁啟超對史學和史學方法的界定，參照了西方現代史學的觀念。他也談到了歷史研究的主客觀問題以及史料中存在的抽象與具體的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史學的主觀和客觀性時說：「故吾以為今後作史者，宜於可能的範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夫然後有信史，有信史然後有良史也」。<sup>18</sup>這說明梁啟超與何炳松一樣，已經接受了西方的史學觀念，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反映真實的客觀歷史，而不是僅僅為了校訂古代的史書。

梁啟超對史料的認識，也受到了西方的影響。他認為史料的種類，主要有兩種，一是文字史料，二是文字以外的史料。有意思的是，他首先討論非文字的史料，譬如「現存之實蹟」、「傳述之口碑」和「遺下之古物」，包括了現代人所稱的口述史料和實物史料，然後他才論述文字的史料，<sup>19</sup>這一種安排，也反映了他的科學史學觀。在傳統的史學中，雖然史家也運用實物史料，但畢竟只是起輔助的作用，不是史家注意的中心，但在梁著中，顯然實物史料已經取得了不同的地位。

可是，在論述史料整理、批判的方法時，梁啟超就幾乎完全以中國傳統為主了。他的古典涵養，為他的著作增色不少。如他在談到搜集史料的重要時舉例說，有關墨子的記載，《史記》中只有二十四個字。但《史記》成書兩千年後，孫詒讓對墨子做了深入研究，通過各處搜集史料，最終得《墨子傳》，有數千言。<sup>20</sup>同樣，他在談到鑒別史料時也用了不少中國史學的例子，並且用這些例子來補充甚至糾正西方史家在史學方法上的論述。譬如，梁啟超在談到史料運用的原則時說，原始史料自然是最有價值的，要瞭解一個人，可以讀他的自傳，如司馬遷的「自序」，王充的「自紀」都是例子。但是，他又說道，自傳也有不少不足之處，如中國古詩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sup>17</sup> 同上書，頁 152-165。

<sup>18</sup>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收入：氏著：《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頁 79。

<sup>19</sup> 同上書，頁 85-104。

<sup>20</sup> 同上書，頁 116。



有些時候，旁觀者反而更清楚。同理，在旁觀者中，自然最爲接近本人的東西最真實。但梁又舉例說，明末徐霞客卒後，由其摯友爲他作墓誌，一般人都以爲這一墓誌非常可信，實際上，梁發現其中也有一些史實的錯誤，如徐霞客因病未能去西藏一事，摯友就不知，反而以爲他得以成行。<sup>21</sup>

梁啓超企圖在史學方法論上溝通中西的作法，也使得他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看法，與以前相比有了不少改變。如他在《新史學》中，曾對中國個正史傳統有不少批評，但從史學方法的角度著眼，梁啓超則發現了其中的不少長處，勝於世界其它各國。「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爲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爲最發達」。而這一發達的原因，在梁啓超看來，正是由於中國有史官建置的悠久傳統。他說道：

漢魏以降，世官之制雖革，而史官之華貴不替。所謂「文學侍從之臣」，歷代皆妙選人才以充其職。每當易姓之後，修前代之史，則更網羅一時學者，不遺餘力，故得人往往稱盛焉。三千年來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爲中心。雖不無流弊，然以專才任專職，習慣上、法律上皆認爲一種重要事業。故我國史形式上之完備，他國殆莫與京也。<sup>22</sup>

在《新史學》中，梁啓超批評中國的修史傳統，認爲是爲一家一姓服務，但現在他從方法論的角度著眼，則顯然有了非常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爲，有了史官建置的這一傳統，中國不僅產生了持續綿延的史學著述，而且在保存和整理史料方面，獨佔鰲頭。

何炳松與梁啓超都在史學方法論上，將中國的傳統史學重新做了整理。他們的著作給人以這樣的印象，雖然中國的史學傳統中比較缺少對史學方法的理論論述，但在實踐方面，則毫不遜色，而有著十分優良的成績。通過他們的分析，中國的史學傳統便取得了與西方史學相埒的地位。他們的工作也反映了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的特質，雖然這一運動旨在改造中國的文化傳統，但在具體作法上，仍然企圖在新的觀念基礎上，將這一傳統重新認識，因此，這些學者工作的大部，仍然是放在中國文化的研究上。

這些「整理國故」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讓人們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其中也包括對中國歷史的新理解。顧頡剛的「疑古運動」，使得人們對中國的上古時代，一下變得將信將疑。從史學革新的觀點來看，顧頡剛所做的還十分初步，他只是從文獻考證的手段出發，發現了幾部僞書，從而指出古史的問題。但從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史學革新的進一步是要擴充人們對史料的認識，由文獻材料到實物材料，以求對過去取得更爲豐富的認識。

在擴充史料、革新史學這一方面，傅斯年的成就比較突出。傅斯年從北大畢業以後，即赴英國留學，以後又去了德國，一共在歐洲待了七年才回國，到中山大學任教。他在國外期間，獲得了倫敦大學心理學的學士學位，但自此以後，便在各系聽課，而以自然科學的科目爲主。由於他涉獵很廣，缺少專攻，因此讓人有一事無成的感覺。傅斯年的老師胡適 1926 年在法國見到他，便頗爲感到失望，認爲傅斯年在海外遊歷多年，並無

<sup>21</sup> 同上書，頁 123-125。

<sup>22</sup> 同上書，頁 55。

多少收獲。<sup>23</sup>其實，傅斯年雖然沒能在海外獲得學位，但他在國外的幾年，還是對他以後的學業，頗有幫助。他旁聽了不少課程，讓他認識到各種學問之間的相通之處，因此就更堅固了他的實證主義的觀念，堅信科學方法的普遍性和各種學科之間的相似性，這個信念，對他回國以後的工作，有深遠的影響。

傅斯年到了中山大學以後，成立了語言歷史研究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在即，他又將該所移到北京，稱之為「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在該所的計劃，就是想溝通各種學問，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歷史。對傅斯年來說，為了真正瞭解上古的中國，必須從實物史料入手，因為文獻史料的爭議太大。於是，他便組織人員到殷墟發掘，用考古的手段，研究殷朝的歷史。經過一段時間的發掘，出土了不少文物，證明殷商的文明不但有文字，而且其經濟社會都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準。這一發現，使得「疑古派」的說法，不再有多少說服力，連胡適都改變了態度，不再疑古了。<sup>24</sup>

傅斯年用比較誇張和明確的語言，闡述了他心中的「歷史科學」的方法，那就是：「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的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用了這些工具，歷史學家能發現各種不同的史料，發現歷史的真相，即所謂「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sup>25</sup>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史學研究的看法。

這種注重實物史料來研究歷史的態度，只是在那時比較突出的一種史學革新的手段，並不為所有的人都普遍接受。其實，雖然傅斯年領導了考古的發掘，但他本人的研究，也還是以文獻材料為主。<sup>26</sup>不過，從史學觀念的革新來說，運用實物史料來參證文獻材料，兩者比較之後來獲取可靠的歷史知識，的確是當時的一大成就。從傅斯年對之的提倡來看，似乎是以西方的影響為主要，但細究起來，我們還是可以見到不少傳統的因素。譬如傅斯年在寫〈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時就說，語言學、或訓詁學的研究，在中國由來已久。他本人在早年也有這方面的訓練，為章太炎的弟子黃侃所欣賞。而他所提倡的實物史料與文獻史料相比較的研究方法，也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一脈相承。這說明，儘管傅斯年以「新」學著名，但他的學術訓練，仍然與清代的學問密切相連。

<sup>23</sup> 見王汎森(Wang Fan-shen)撰“Fu Ssu-ni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p.97。

<sup>24</sup> 見劉起鈞：《顧頡剛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62。有關從「疑古」到「信古」的過程，可見屈萬里：〈我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收入：《中國通史集編》（香港：未名書屋，無出版日期），頁246-266。

<sup>25</sup> 《傅孟真先生集》，第4冊，頁177-178。

<sup>26</sup> 可見傅斯年的代表作：《夷夏東西說》和《大東小東說》。

### 三、現代史學與現代文明

從中國現代史學的演變發展來看，以胡適、傅斯年等人所提倡的「科學派」，無疑是代表了當時新文化運動中「新」的一面。但是，通過我們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見到，在這種「新」的學問中，仍然有不少傳統的成分。胡適等人對西方科學方法的理解與改造，梁啟超、何炳松將之運用於歷史研究的嘗試，以及傅斯年以這種「新」的手段研究中國的上古時代，表明這些以「新學」、「西學」聞名的學者，都在很多方面與傳統保持著緊密的聯繫。由是，我們可以對新文化運動有一個不同的認識。也許，五十年代以來「新儒家」對五四運動的批評與指責，並不完全正確。

不過，對五四運動所包含的傳統方面的認識，其實並不新鮮，以前已經有不少學者對此有所闡述，譬如美國學者 Joseph Levenson 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國現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中國的舊傳統藕斷絲連，因此導致了他們思想觀念以及理想追求的不徹底性，以至最終的失敗。<sup>27</sup>這種觀察反映了冷戰時期美國對現代中國歷史的解釋，以及對中共政權的態度。儘管如此，美國學者從局外人的角度，研究中國的問題，有其不同的觀察點，而中國學者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則常常過分注重其崇尚西學的一面。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如果我們承認在新文化運動中有「新」「舊」之間的聯繫，那麼應該如何看待和解釋這樣的聯繫呢？當代的文化研究，已經在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有了不少論述，也許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工業革命完成以後，不斷對外殖民擴張，利用工業革命的成果，在亞、非、美洲等地征服，幾乎所向披靡。西方軍事上的勝利，也有助於其文化上強勢地位。因此，在幾乎所有非西方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西化」運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其中之一。當然，現代中國雖然在與西方強國接觸時，傷痕累累，但畢竟沒有被徹底征服，淪為殖民地，與印度、埃及等地不同。不過，從印度等西方殖民地的經歷來看，西方文化雖然在一時凌駕一切，但其實也無法真正全面壓倒本地文化。相反，有許多例子證明，在西方向非西方地區推廣其文化的同時，也同樣受到非西方地區文化的影響，以至對其本身的文化，造成各種影響。如賽義德（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就指出，現代英語文學的課程，首先是在印度開設以後，然後才引進回到英國，成為英國大學教育的重要課程。<sup>28</sup>

同樣，我們也可以自然地認為，在現代中國人接受和消化西方文化的時候，也會對這一外來的文化進行選擇和改造，不會無條件的接受。在胡適等人進行史學革新的時候，我們所見到的正是這種新與舊、中與外不斷協商與交流的過程。對於這種協商，我們不應過於指責，認為是體現了新文化運動的不徹底性。同理，我們也不必對此感到沾

<sup>27</sup> Joseph Levenson 的代表作是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和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sup>28</sup>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42。

沾自喜，認為是中國文化頑強生命力的一種表現。事實上，在現代世界，文化之間的溝通或者沖突，都經歷過這種類似的協商過程。印度學者 Partha Chatterjee 已經發現，非西方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通常是以反抗西方的帝國主義統治為目的的，但其表述形式，則往往是西方式的，<sup>29</sup>用中文來說，也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因此，賽義德指出，

雖然西方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相互激勵，但即使在衝突最為激烈的時候，它們也不是單一的，或者能由一方決定一切的。事實上，文化也絕不可能是單一的。它既不是東方或者西方的私有財產，也不歸一小部分的男人或者女人所有。<sup>30</sup>

現代文化的「混雜性」(hybridity)，正是其生命力的表現。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在中華文明走向未來的時候，我們應該不斷保持一種對外開放的態度，在與外來文明不斷接觸交流的過程中，充實補充自身，以保持永久的生命活力。我們不必庸人自擾，以為對外開放，會導致自身文化的敗落。如果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烈，都包含有大量傳統的因素，何況其它？事實上，只有通過對外的接觸，才會真正認同自身文化的不同及其價值。這正如人們在到國外旅遊的時候，往往才更深入地認識到自身文化與國外文化的差別來，文化之間的交流，也會增進文化的認同感。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兩重性也讓我們看到，雖然在那個時代，激進與保守似乎界限分明，其標誌是如何看待自身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係。強調文化變革之需要的，則被視為激進、改革的代表，反之則視為保守。但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這兩者之間的區分，主要表現為態度的不同，而在文化交流的具體結果上，並不會產生巨大的差別。這是因為，在自身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碰撞的過程中，雙方都會有交互的影響。熱衷西化的人，並不能完全把傳統拋棄，而固守傳統的人，也無法拒絕外來的影響。如倡導「全盤西化」的胡適，一生都致力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研究，而處在他的對立面的「學衡派」，對西方學問的了解，與他相比並不遜色。因此，所謂「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差別，只是一種依當時情況而定的態度上的差別。余英時先生嘗言：「這兩個態度（激進與保守）是相對於某一種現狀、某一種現存的秩序來說的」，<sup>31</sup>就是這個意思。因此對於這一差別，我們需要有歷史的眼光，既注意當時的情形，又看到以後的發展。這是史學研究的長處，也是五四史學的變革對我們的啟示。

五四時期的史學革新，也讓我們認識到，在文化經歷重大變遷的時候，史學往往有舉足輕重的表現。歷史研究從本質上來看，起了一種將過去與現在相互連接的作用，這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已經屢見不鮮。西方學者也認為，「過去是外國」，因為人們每次到國外

<sup>29</sup> 參見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和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30</sup>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xxiv。

<sup>31</sup>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見氏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188-222，引語見頁199。

走動的時候，都有可能產生新的發現。<sup>32</sup>這是因為人們在國外旅遊，都會不斷地將自身的經驗帶去，做情不自禁的比較，而因為自身的經驗也在不斷變化，因此每次涉足海外，都會有新的發現。由此看來，人們研究歷史，也同樣受到現在條件的影響。由於現在條件或情景的變化，就需要不斷重新研究歷史，重新認識過去。以五四時期的史學革新來看，當時的史家用科學的態度審視過去，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發現科學的因素，與現代文明作溝通，也就是在新的觀念下重新寫作了中國的歷史，重新塑造了中國的傳統。<sup>33</sup>同樣，我們在新的世紀，也應該用新的眼光看待中華文明的傳統，從新的觀察角度，也即全球文明的觀點，為中華文明重新定位。這是對所有關心中華文明的人的一個挑戰，史學家更是責無旁貸，至於我們該如何應戰，尚看諸位的努力。

---

<sup>32</sup>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up>33</sup> 參見拙著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story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UNY Press, 2001)。